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蔡元培



1940年3月3日，香港九龙。一位73岁的老人突然摔倒在家中，鲜血从口中吐出。家人惊慌异常；急忙请来医生诊治。

老人躺在病床上，神情安详，脉搏正常，仿佛是睡着了。周围的人默默祈祷，祝愿老人能够起死回生，尽快康复。国家、民族正需要他呀！

但是，第二天午后，老人的病势突然转危，排血不止，精神骤衰，神志开始模糊。一直持续到5日上午9时45分，有几位自愿给老人输血的志愿人员刚刚赶到，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

一代宗师，就这样在那个新旧交替、风起云涌、跌荡起伏的岁月与世界中，走完了他丰富曲折、不断追求的光明人生之路，带着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

他就是被后人赞誉为垂范士林、楷模后世、以通人而兼学人的中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爱国主义者、文化知识界的革命先驱蔡元培。

蔡元培生活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抗日战争中期。他的生命历程横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穿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充满了丰富复杂的传奇色彩。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充满内忧外患、横遭外国侵略者蹂躏的悲愤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勇猛斗争的英雄时代。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舞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年代里，蔡元培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在惊涛骇浪的历史大河中，在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多次较量中，上下求索，不断实践，走过了光辉灿烂的人生之路。

## 一、刻苦学习、富有爱心的早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我国东南部的历史名城浙江绍兴。

在历史上，绍兴是浙江东北部的文化中心，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蔡元培就是他们当中承前启后的一位。绍兴又是出产酒的地方，所以蔡元培从小就能喝酒。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庐(qing)。后来，他自号为民友，意思是老百姓的朋友。再后来，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子民，意思是“遗留下来的老百姓”。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云汉》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讲周朝剩余的老百姓，没有一个存留。蔡元培自号为子民，是说人民杀不绝、除不尽，含有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意思。蔡元培出名后，人们都很尊重他，就叫他子民先生。

蔡元培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商人。10岁的时候；蔡元培的父亲病死了，家境也因此衰落下来。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刚强，就是不肯要，宁愿典押衣物，克勤克俭，也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与生活能力。就这样，少年时代的蔡元培，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艰难度日。后来，蔡元培曾经说过，他自己宽厚待人的性格来自父亲，不拿人家东西、不随便讲人家坏话的美德则得力于母亲的垂教。

从5岁时起，蔡元培就进入家塾读书了。他所接受的启蒙课本，全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儿童读物。接着，开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学习写作八股文。他读书特别用功，但家里穷，点不起油灯，只好借着炉灶中的火光照明。有一次，他在楼上念书，房子起了火，家里人急忙叫他下楼，可他一心一意读书，竟然听不到呼喊。他这种刻苦学习的劲头，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也受到同学们钦佩。

十几岁时，蔡元培在叔父指导下阅读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例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读得非常熟。通过这些书，他不但得到好多知识，而且思想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传统的孝道，对他影响特别深刻。有一次，母亲病倒了，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非常认真。而且，他听说人身上的肉能延年益寿，就毫不犹豫地从我自己手臂上刮下一块肉，和在汤药中，给母亲服用。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却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因而深受左邻右舍的赞赏。

母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尽完孝道，睡草席，枕土块，以寄托悲哀。他的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便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不久，哥哥张罗着要给他娶媳妇，他一边哭，一边恳求哥哥取消婚事。理由是，在母亲死后没有尽完孝道的时候，他决不能结婚。同时，他用更加刻苦的读书学习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在学习上，他本来天份就很高，加之勤奋，有上进心，所以，进步非常快。他写古文总喜欢用些通假字和奇特的句子，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

通过上面说的事情，可以看出，蔡元培自小就有孝敬父母的深深爱心。这种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国家，就变成对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并成为读书上进、长本领报效国家的动力。蔡元培认为，一个爱国家的人，在家里必然爱自己的父母。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祖国呢？但是，蔡元培虽然主张孝敬父母，却不主张忠君。我们今天虽然不赞成蔡元培割肉和药那种孝敬父母的不科学的做法，但他孝敬父母、努力学习上进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来，父母亲让他读书，是希望他“学而优则仕”。读好书，取得功名，好当官。这是封建时代家长们让孩子念书的普通心态，蔡元培的父母也不例外。而蔡元培的青少年时期，也的确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在科举致仕的阶梯上艰难攀登。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在原本很艰险的科举道路上步步登高，一帆风顺。1883年，16岁，考中秀才；1889年，22岁，考中举人；1892年，25岁，考中进士，被点为清政府最高学府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种文职官员的名称）；1894年，27岁，又提升为翰林院的编修。连中三元，可谓少年得志，科场生涯圆满完成。至此，父母对他的期望完全实现了。

据说，蔡元培考进士的文章广征博引，有些字句连主考官都不懂。所以，科举致仕后，蔡元培的学识立即受到大名鼎鼎的户部尚书、学问家翁同和赏识，赞誉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俊才”。这时，不足30岁的蔡元

培已经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更诱人的政治前景在向他频频招手呢！如果蔡元培迷恋荣华富贵，满足现状，或者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完全有可能青云直上，跻（j）身于达官显宦之列。但是，那样的话，他就会被时代的风潮所荡涤，所抛弃，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殉葬品。时代风潮，汹涌澎湃，何去何从，亟须把握。在中国历史的转型关头，蔡元培也面临着决定他今后生命轨迹的关键选择。

事实是，蔡元培选择了一条跟随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光明大道，成为封建统治阵营里反戈一击的“叛臣逆子”，成为为新时代呐喊开道的先进人物。

## 二、“翰林革命”的日子

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古老的东方泱泱大国，竟败在东邻小邦日本手下。接踵而来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使举国为之震惊。同正直的中国人一样，蔡元培也震惊了。他悲愤交加，心如刀割，转而激昂奋起，与其他忧国爱土之士一齐，联名上书清政府，反对议和，力主抵抗。他感到，《马关条约》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之心。两年后，德国人又占领了胶州湾。他感到，要想挽救国家，已经不能依靠那个给予他功名然而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救国救民的道理。于是，他开始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从熟读勤写、孜孜研求的经史子集古典著作中走出来，转而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西方的新式书籍。这种阅读，几乎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举凡史地政教，声光化电；自然人文，数学物理，无不恣意披阅，以满足自己救国救民、寻求知识的强烈欲望。一些先进的中国启蒙人物，如郑观应、马建忠、梁启超的著作，不但阅读，还特别给以评注。他还自修日文，在翰林院内钻研那些被封建顽固派骂为“奇技淫巧”、“左道旁门”的西方科学知识。此情此景，正像他北京寓所书房中悬挂的十个大字所说：“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

几年后，蔡元培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到1898年（农历戊戌年）前后，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波及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思想已经发生变化的蔡元培深表赞同。本来，他与大才子梁启超具有己丑（1889年）同年的关系，对豪气纵横、敢于“冲决一切网罗”的谭嗣同更是格外佩服。但那时梁启超与谭嗣同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他不愿让人家说自己“攀龙附凤”，便没有前去结交。但是，在思想感情上，他与维新党人却是相通的。所以，当“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同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这种举动，使同乡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他也丝毫不作辩解。

回到家乡，恰好绍兴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他便被推荐为这所学堂的监督（校长）。当时，他身材短小，文质彬彬，儒雅风流，时常与朋友喝酒聊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他觉得，康梁变法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预先培养革新人才，致使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归于失败。所以，他接受监督这一职务，就是想利用学校储备革新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本来，学校里只有英、法两门外语课，他上任后，又新增加了一门日语，并且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提倡民权、女权，讲授进化论。这样一来，便把学校中的旧派保守人物惹怒了。特别不能让旧派人物容忍的是，1900年6月，他的夫人不幸病逝，人们都很关心这位年轻翰林的婚事，帮忙介绍对象的人踏破门槛。而他居然公开征婚，并提出五项非常“苛刻”的原则：第一，女子必须不缠足；第二，必须识字；第三，男人不许纳妾；第四，丈夫死后，女人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果感情不相合，可以离婚。这在当时那个封建时代，简直就是吓人。结果，给他介绍对象的媒人纷纷沮丧而去。经过一年选择，他终于得到了意中人。结婚那天，蔡元培还变革婚礼习俗，不搞闹房，只请一般好朋友来家演讲男女平权、男女平等。有一位客人当场说：假如你的夫人比你学问高，那你就应该把夫人当做老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夫人。蔡元培笑着回答：学问总是有大有小，但从人格上看，却无所谓大小，而是平等的。

由于类似的举动，所以旧派人物恨他，便去告状；他的顶头上司拿皇帝“正人心”的“上谕”来压他，让他恭敬书写下来，挂在家中的大堂里，每天反省。他不服，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不再干什么“监督”了，任期只有一年左右。

通过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来，蔡元培已经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先前那个一心一意科举道路上攀登的蔡元培了，而是转变成为开时代风气的先进人物了。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时代的激荡，同时，也与蔡元培卓尔不群的胆识相关。在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统治人们思想的旧时代、旧环境下，蔡元培敢于提倡男女平权，并且能够以身作则，需要有非凡的胆识，这是值得人们赞誉的。

辞职后，蔡元培在1901年秋又得到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职务。所谓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由大官僚盛宣怀开办于上海的徐家汇。这所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所以在教育史上非常有名。蔡元培上任后，便教学生阅读翻译日文书，尽一切机会培养学生的爱国心。例如，他尽给学生出这样的作文题目：“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监禁与流放两刑用意之异同”等等，通过学生的作文，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人一向具有爱国的好传统，应该尊重人民的权利。他还通过给学生日记与作文写评语的方式，向学生们灌输民权思想。每天早晨5点来钟，他必起床，步行十几里，到马相伯先生那里学习拉丁文。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便要他8点以后再回来，他便按时再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都是蔡元培这时期教过的学生。

第二年4月，蔡元培又与叶浩吾、蒋观云等近代有名的人物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并被推举为会长、总理。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之一，发展会员达到100多人，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也由此开始。但是，没有钱办不成事。为筹措经费，他前往南京筹款。当他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得知：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心如刀割。然而，他没有回家，义无反顾地毅然登船，向着古城南京驶去。3天后，借得6千元而归。

有了钱，蔡元培与师生们便轰轰烈烈地干开了。他们开办了科学仪器馆、

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还在常熟办了小学。对南洋公学退学的同学，便在爱国学社重新开课。但是，他们不是不问世事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加政治，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参加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大唱《爱国歌》，举行演讲会，进行军事训练。蔡元培剪掉辫子，脱掉长袍，换上操练衣，与学生们一起进行军训。他们还把《苏报》变成机关报，发表文章，宏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与人合作出版《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元培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涂东西”，提出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土，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在革命活动中，蔡元培总是吃苦在前，勤勤恳恳，不怕艰难。办《警钟日报》的时候，他不仅早已剪掉辫子，而且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是改穿新式的德国装（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天气非常寒冷，编辑室既大又空，没有火炉。他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馒头，只好在右手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写作。每天晚上，他必须赶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的，一篇白话的。而且，编辑所的伙食、印刷、开支、发行等繁琐事情，他都要管。到过年的时候，所里一分钱没有，蔡元培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子去抵押，结果典当铺的老板说那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因此年也就只好不过了。但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为扩大销路，他让一位同乡的工人背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每天居然能够多卖出一二百份，蔡元培非常高兴，用绍兴话夸奖这位工人说：“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但没有多久，就有人来干涉，不能再继续叫卖了。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蔡元培还参加了谋杀清朝官吏的暗杀团，租房子，造炸弹，饮鸡血，发誓言，搞暗杀。本来，暗杀并不是进行革命的正当手段，不宜提倡。但是，它表现了蔡元培当时大无畏的好汉精神。为制造暗杀工具，他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液体毒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也容易被人发现，必须改进为固体的毒药粉末。于是，他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理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就进入对炸药的研制与试验。制造炸药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工厂，供奉着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牌位，志士们写好誓言，书于纸上，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在酒碗中，人们跪下宣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清政府非常害怕，两次开列逮捕名单，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但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租界当局尽管连续六次传讯蔡元培，他每次都都留下住处地址，清政府想抓他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炎。邹容在监狱病死以后，蔡元培又积极参加办理丧事，举行追悼大会，并在墓地建立邹容纪念塔。他还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章先生上船去日本。

那时，有个叫沈荃的爱国志士，在北京得到消息，清政府同沙俄相勾结，

准备让沙俄独占中国的东三省，当即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文章，将这一阴谋揭露出来。留学生们听说此事，立刻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爱国学社也召开拒俄大会。清朝廷又害怕又恼怒，便把沈荇逮捕，用竹鞭子抽打，达4个小时之久。沈荇全身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并没有被打死。最后，刽子手用绳索勒沈荇的脖子，才把他勒死。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众全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04年11月，暗杀团在上海扩大改组为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入会仪式上，蔡元培佩带金牌徽章，中间用篆文刻一个“复”字，举手宣誓：“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成立后，继续从事暗杀和暴动，成为清末最著名的革命团体之一，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经何海樵介绍，在上海加入这一革命组织，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此后，蔡元培便在上海设立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坚实基础。

在革命洪流中，蔡元培日益成熟，留下一串串传奇式的英雄故事。他不但对清王朝再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极力要推翻这个封建王朝。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从反封建的革命需要出发的，与当时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相一致，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自己曾经回忆说：“自组织爱国学社，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热烈环境的影响，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又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正因为他的这种革命气概，人们称赞他，佩服他，说他是“翰林革命”。

### 三、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首届教育总长（即部长）。当了大官，许多身穿笔挺礼服的人纷纷前来拜访、道贺。正当这些人准备进门时，只见蔡元培身穿短袄，双手沾满肥皂泡沫，一边擦抹，一边急步迎出来，连说：“没关系，有劳诸位了，请里边坐。我闲着没事，就旧事重做，随便洗洗衣服。”来宾都觉得不好意思，窘状满面，蔡元培却满不在乎。

教育部刚刚成立的时候，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加上蔡元培，统共才有3个人。为找寻办公地点，蔡元培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总算找到了三间房子。接收下来的档案材料，也都是他亲自雇车运到教育部的。甚至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他亲自跑到孙中山的大总统府领回来的。后来，教育部由南京迁到北京铁匠胡同，人员扩大，加上具体办事人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而其他各部，有的达100多人。部里每月全部开支只有千元，从总长到文书，不分等级，大伙拿一样多的薪水，每人每月30元。但是，从每天上午9时到下午4时半，大家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分工办事，工作效率非常高。在这些

工作人员中，就有著名文学家、也是蔡元培同乡的鲁迅，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方面的工作。鲁迅与蔡元培之间的深厚友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外，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著名人士蒋维乔、许寿棠、王云五等，都是蔡元培亲自请来的干练之才。

蔡元培本人工作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懈怠。以后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颁行的各种学制、课程设置、管理规程等法案，大都是这一时期草就的。这种快捷的办事效率，与清末学部机构重叠、冗员众多、办事拖沓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位主管中央教育部门的最高官员，像蔡元培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前后只有半年）办了那么多有益于中国教育事业进步的大事。蔡元培既雷厉风行又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为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以后的长期教育实践中，不断加以补充、改进、完善，因而建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元培本来就非常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现在做了中国教育界的最高官员，觉得自己更应该为全国的老师、学生做表率，于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在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他本人的画像，上面写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书桌旁还摆放着他书写的六字条幅：“学不厌，教不倦。”这可以说正是他的人格写照。在实际生活中，他不乘轿子，不坐人力车，同朋友们组织“进德会”，主动以道德修养相约束，几乎没有一天不读书、不写作，周围的人对他都非常佩服。特别是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一成立便列出各种道德规范，供参加者参考选择，从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些规范包括：不赌博，不受贿，不送礼，不迷信，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污物，不骂人，不喧闹，不粗暴，不早婚，不歧视妇女，不多生小孩，不轻视普通人，等等。当时有人在报纸上评价蔡元培等人的举动说：“此举似微，然于个人之精神、社会之风气，关系甚大，果能鼓吹实行，可一扫从前政界之恶习。”

在这一时期，蔡元培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就任教育总长之后，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为新式教育方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尔后，他又发起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进一步充实自己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采撷西方文明的优点，融合哲学、科学、美学于一体，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科学价值，迥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旧思想。他主张废除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并且停止祀孔，废除读经，代之以军国民主义和实利主义相结合、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支柱的新式教育。为此，他还提出，必须使公民具备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种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又建立在美感教育的基础上。什么是美感呢？美感是美丽与尊严的统一，是从现象世界步入实体世界的桥梁，是使人的精神升华的动力。他举例说，人们看到真正的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就会感到害怕，而在图画中看到此情此景，反而觉得美。美感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使人们摆脱杂念，进入纯洁、高尚的境界。后来，蔡元培又进一步提出，要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全面发展。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受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批评。有人写文章，说他不祭祀孔子的主张是“祸我国民”，是想把数千年流传的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但后人却给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教



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章，特别是他的美育思想，发聋振聩，是对封建迷信与宗教教育的有力一击。

#### 四、留学与领导勤工俭学运动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之前，曾经受人资助，于1907年，当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还寥若晨星的时候，就以一位“名翰林”的身份，随同中国驻德公使孙宝琦一道，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德国自费留学。

到德国后，他先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语，并且编书、给人做家庭教师，换钱糊口。第二年秋天，进入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人类学。不过，他下工夫更多的，还是实验心理学和美学。他曾经到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在老师指导下试验人体各种官能的感觉迟滞程度。这对一个来自东方封建国家的年轻学子来说，是要有相当胆识的。他还到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比较文明史，并在课余时间请老师到寓所来讲授德国文学。4年里，他编著了5册《中学修身教科书》、1册《中国伦理学史》，还翻译出一部《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原理》曾经对青年毛泽东发生过很大影响。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语，还写了读书心得《心之力》，受到老师杨昌济先生高度赞赏。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时，曾经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在莱比锡，他听一位朋友说吃肉很有害处，又在阅读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见其中描写打猎的情形非常残酷，于是决定不再吃肉，只吃蔬菜。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蔬食有三大好处：卫生、戒杀、节用。他本人所以不吃肉，则主要是出于“戒杀”的缘故。在生活上，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多余的欲望。

1912年7月，蔡元培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觉得当官可耻，便约宋教仁等几位同盟会员一同退出内阁，他本人因而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辞职那天，他和宋教仁等人来到总统府，袁世凯一方面假装好人，一方面想继续利用他，便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坚留总长。”蔡元培回答：“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民之代表而辞职。”意思是说，他的辞职是为了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这时，他听说有一个留学生的空缺名额，出于不断充实自己的考虑，便写信请求教育部把这个名额留给他。教育部的人非常为难，觉得蔡元培是前任教育总长，怎么好去做留学生呢？可蔡元培又非常穷，如果不给予资助，他本人根本就去不起。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为蔡元培筹集到一些钱，对外只说是让他到欧洲去游览，实际上依然是留学。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着大总统的宝座，也正有意把蔡元培赶到国外，免得他在国内“捣乱”。因此，蔡元培便在这年秋冬，以46岁的年龄，第二次来到德国东部名城莱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讨学问。转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便召蔡元培回国一同斗争。6月，他一回到祖国，就发表文章大骂袁世凯行暗杀、蹂躏人权、祸国殃民，鼓动群起讨袁。还为国学大师、他的老朋友章太炎先生与汤国梨女士充当了证婚人。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参加了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不久，“第二次革命”遭到

失败。蔡元培决定带着家属去法国。

1913年10月，蔡元培来到法国，一住就是3年。这是他第三次到欧洲研究学术，主要学习法语，进行写作和翻译。为筹措出国费用，他与商务印书馆定有协议，到达欧洲后，必须每日以半天时间为商务编写书籍，商务则每月给他200元钱作为稿费。但是，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最适合搞学问，却没有完全关在书斋里，而是与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一起，发起一项重要活动——留法勤工俭学，从而揭开近代中国留学史上别具风采的一章，他本人也以崇高的声望和教育家的务实精神，众望所归地成为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就当时而言，不留学，就不能真正学习并体会到西方的先进知识；要留学，费用又太高。勤工俭学是克服这个矛盾的有效办法。“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知”就是所说的勤工俭学及其宗旨。蔡元培同吴玉章等朋友一起，为留学生做了许许多多好事。

初到法国，蔡元培对旅法的学生和工人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并经常为同学们作学术演讲。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焰燃及法国，同学们的国内汇款难以寄达，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学生们纷纷要求回国。为劝说同学留下，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组织了“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蔡元培亲自撰写该会的通告，劝导学生完成学业，并帮助同学们进入没有战火的法国西南部，找寻学校，筹措学费，总算平复了这次危机。

战争使法国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有许多中国工人被招到法国工作，称作“华工”。华工大多文化水平低，加上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所以往往受法国人欺负，而且明明被欺负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讲理、如何去讲理。为维护同胞的利益，也为了中国人的尊严，蔡元培又担负起对华工的教育工作。1916年6月，他与吴玉章及法国朋友等人一起，发起组织留法运动的权威组织“华法教育会”，并担任中方会长。在这个组织的领导协调下，蔡元培给华工争回一些权利。例如，干一样的活儿，中国人拿钱少，法国人却拿钱多。蔡元培与大家经过努力，华工与法国工人实行了同工同酬。蔡元培还创办并主编了《旅欧杂志》，建立了华工学校，为在法国工作的中国工人编写教材，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大大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华工学校里开设法文、中文、算术、图画、工艺、卫生、修身等课程，蔡元培亲自讲授德育和智育课。通过学习，工人们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素质，许多人回国后成为有文化有见识的优秀技术工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其后，蔡元培虽然回国，但对勤工俭学的领导组织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留学工作的组织机构也随着他与李石曾的回国而转回国内。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是为中国工人阶级造就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培养出一大批新中国的杰出领导人。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吴玉章、向警予、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人，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重大贡献，也都是留法的。革命老人吴玉章曾经饱含深情地说：“这也应归功于子民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没有人能说清蔡元培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了多少事，付出了多少心血。然而，在繁忙琐碎的工作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忘记学习，没有忘记写作。他本人学习起来特别刻苦。夏天，天气酷热，他把房门关起来，脱掉衣服，埋首苦读。朋友来访问，从门缝中一瞅，见他独坐室中，袒胸露背，专心读

书，便轻步退回，不再敲门。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编著了《哲学大纲》一书，还编著了《欧洲美学丛述》、《欧洲美术小史》等著作的若干部分。最有名的，是他撰写了《石头记索隐》一书，专门考证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历史真实成分，使他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有名的索隐派代表。说起所谓“红学”，人们总要提到这部《石头记索隐》。

## 五、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许多人给蔡元培打电报，希望他回国。蔡元培回电表示：回国可以，但不愿做官。这时，著名学者马叙伦等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他做北京大学校长，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也发来正式邀请电。正在他考虑是否接受这一职务的时候，来了一批朋友，发表许多看法。有的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后若不能治理好，对自己的名声有害处，还是不去为妙。但也有人说，既然知道它腐败，就更应该回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尽了责任。蔡元培本来就有教育救国的信念，对兴办高等教育又一向兴趣浓厚，于是，便接受朋友中的后一种意见，并得到孙中山支持，与吴玉章一道，于10月2日由法国马赛乘轮船启程回国，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

说北京大学腐败，真是一点不假。那时，穷人家的孩子大都上不起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官僚子弟，一心想升官发财，没有半点钻研学问的兴趣。平时，学生们抽大烟，搓麻将，逛戏园，抄讲义，几乎无所不为。只要是能够让他们当官的老师，不管有没有学问，他们都欢迎。反之，则起哄闹事，以赶跑老师为快。这些老爷学生上学还都带着佣人。上课铃响后，佣人便过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老师也都是些没有学问的官僚。所以，当时人说北京大学是“官僚养成所”。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上任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那天，学校的工人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摘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工人们回鞠了一个躬，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不久，他发表演讲，明确对师生们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勉励学生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励德行，三要敬爱师友。总之，希望学生们转变一心当官的旧观念，确立研究学术的新观念。学生毕业时，他送每人一把铜尺，上面刻“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10字，以表示他的期望。

蔡元培的就职演说，是他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教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尔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

大学能正常运转，教师是关键。蔡元培在抓紧学生教育的同时，也抓紧教师队伍的建设。那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中有许多不合格，蔡元培毫不客气，全部辞退。有个法国教员，被辞退后不服气，要控告他，他不予理会。还有3个英国教员，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说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朱尔典离开后，恼羞成怒，就威胁说：“看来蔡元培是不想当北大校长了。”蔡元培一笑置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随后，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教师还不甘心，提出上诉，英国公使也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施加压力。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信，劝他向外国人低头。蔡元培回了一封信，

不客气地对这位外交部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结果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

对那些有崇洋媚外心理的教师，蔡元培也不客气地给以批评。当时，有些中国教员上课时不说中国话，却只说外国话。蔡元培明确规定，除了外语课，其他课程的教学一律使用中国话。

那么，该让什么人来大学任教呢？蔡元培在北京走访了一些朋友，有人向他推荐陈独秀做文科学长。他听后精神为之一振：陈独秀，不就是经办《新青年》杂志的那位鼎鼎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吗？他立刻跑到前门外一家旅馆，找到陈独秀，与他商定做文科学长。此时，蔡元培到北大还不足 10 天。接着，文科方面，他请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君默、周作人等一大批思想先进的著名学者，李大钊并任图书馆馆长。理科方面也聘请到一批有真工夫的科学家，其中有李四光、丁翼甫、王抚工、颜任光、李书华等。法科教员则有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等知名学者。这些人聚在一起，可真是不得了，北京大学一下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地，成为带动全国的思想中心。蔡元培则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国元勋，近代中国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与保姆。

不过，对那些思想很旧但挺有学问的人，蔡元培也并不排斥，而是同样网罗到学校里来。这就是常常被后人所称赞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无论为何种学派，倘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他对教师只问学问能力，不问资格年龄，也不过问个人信仰。从复辟党到共产党都可容纳；从国学到西学，一律注重。但是，老师们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允许把与学校制度相违反的个人信仰向学生灌输。人们称赞他“具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十属罕见。”表面上看，他的做法似乎是在搞无原则的调和，实际上，是对新兴但还幼小的革命势力的一种最可行、最有实效的保护策略。

蔡元培不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兼容并包”并不是什么都“容”，什么都“包”，并不是无主张的杂凑。他不允许在大学里尊孔祀孔，不允许设置经学科目，不允许开设宗教课。当时，北京大学里有两位老顽固，一位叫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到民国时还留着小辫子；另一位叫刘师培，是年轻的国学大师，学问很大，但在历史上有不少污点，曾经叛变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为两人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所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说：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此外像文史学家黄季刚、陈汉章、崔适等人，思想都比较保守，但是有学问，蔡元培全都予以留任。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有一技之长，蔡元培就任用，并不因那人有缺点、有污点就否定那人的长处。这种风范，就是中国古人说的美德：“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正因如此，有人说蔡元培能在“无所不包”之中“有所不为”，以达到“有所为”的目的，说他不因宽容大量而不趋新，于人无所不容而自身却具有定力。还有人称赞他能在许许多多凳子的夹缝中坐稳坐牢，并且表演自如，具有非同凡响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

## 六、北大的新面貌与“蔡林之争”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 51 岁了。他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劳碌半生，终于有了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使腐化堕落的旧北大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新型大学，从而展示出蔡元培教育生涯中最光辉灿烂的一章。

在蔡元培的直接领导与扶持下，各种各样的社团成立了。例如，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化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数理学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等等，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而起，活跃一时。蔡元培或参加活动，或到会致词，或兼任社团职务，等等，总是极力促进社团活动的开展。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形成一个个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策源地。社团中的许多老师、学生，也在交流与斗争中不断充实与成熟起来，有的成为大科学家，有的成为大文学家，有的成为大思想家，有的成为大政治家等等，为祖国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在现代史上留下令人敬仰的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也参加了北大一些社团的活动，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原来，1918 年 8 月，毛泽东因为家乡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老先生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的家中。后来，杨老先生把他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在北大旁听课程，充实自己。由于毛泽东喜欢看报纸，又喜欢哲学，便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活动，还得到过听讲半年课程期满的结业证书。新闻研究会定期请大名鼎鼎的记者邵飘萍来讲课，给毛泽东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曾经回忆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还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蔡元培还改革旧体制，建立民主治校的大学评议会，组织各系教授会，使整个学校充满自由、民主、活泼的气氛。他认为，学校不能校长一人独揽大权，有事情应该大家商量，并把这种民主作风通过规章制度固定下来，不因校长的去留而改变。这种改革，发挥了教授、职员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克服了一长制的传统和官僚衙门作风。有些改革措施，一直为今天的大专院校所沿用。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招收女生入学，带头提倡平民教育；宣传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科学与民主，攻击旧思想与旧道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特别是招收女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但更了不起的是，他公开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庄严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动的世界。”在他笔下，像什么凭借遗产过活的纨（wán）袴（kù）儿，卖国营私的坏官僚，克扣军饷的贪军官，操纵股票市场的奸商人，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咨（zī）议、议员，等等，全都原形毕露，受到猛烈抨击。他还

把新思潮比作洪水，把军阀比作吃人猛兽，认为对洪水要用疏导的方法，使其自由发展，去冲卷淹没（mò）那吃人的猛兽。在蔡元培的支持带动下，北京大学成了全国的思想中心。有人甚至说，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新纪元。

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者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蔡元培在“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实际上暗中支持新文化的代表陈独秀、胡适等人，并且就是一伙的。于是，按捺（nà）不住心头的恼怒，起而攻击蔡元培。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气又很会写古文的封建旧文人，名叫林纾（shū），字琴南，带头向蔡元培发难。他先是写了两篇叫《荆生》、《妖梦》的小说，含沙射影地攻击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在小说《荆生》中，林琴南瞎编乱造，说陈独秀、钱玄同、胡适3个人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相互议论，大骂孔子的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在他们谈得热闹的时候，猛然听到一声巨响，墙壁崩塌，从里面出来一个“伟丈夫”，名叫荆生，手持一把铜筒，重18斤，指着3个人大声喝道：你们这些畜生，居然在此胡说八道，该当何罪？陈独秀刚想辩解，只见荆生捻起二指，在其头顶一按，陈独秀立刻头痛倒地，宛如锥刺。接着，荆生一脚把胡适踹倒，疼得胡适仿佛腰都断了。钱玄同是近视眼，荆生把他的眼镜扔到地上，吓得钱玄同急忙磕头，仿佛刺猬似的。荆生冷笑一声，说道：你们这些怪物，给我滚。3人屁滚尿流被赶下山，荆生在山上发出长长的狞笑！小说《妖梦》则骂蔡元培是“鬼”，最后被一个能吃月亮的妖精吃到肚子里，然后又被变成大粪排泄出来，臭不可近。这两篇小说把封建顽固派对蔡元培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仇恨心理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

但是，林琴南发觉自己的小说并没有发生效果，于是，撕下伪装，摆出一副“拚我残年，竭力卫道”的架势，用文言文发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气势汹汹地向蔡元培兴师问罪。他怪里怪气地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叛亲蔑伦”，“人头畜鸣”；咒骂蔡元培凭借校长的位子和势力施行“趋怪走奇之教育”，要求蔡元培安守本分，不要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流合污。

在林纾发表公开信的前后，一些封建顽固人士也都蠢蠢欲动，活跃一时。他们写文章，搞串联，甚至勾结军阀政府，恨不能把新文化运动一把掐死。

针对林纾的公开挑战，蔡元培没有屈服。一天晚上，有两个人在蔡元培家对他说，应该把陈独秀解聘，同时约束一下胡适，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对北大的各种不满。蔡元培等他们唠唠叨叨把话说完，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他也回敬给林纾一封公开信，摆事实，讲道理，把林纾的指责与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逐一对照，使人们明白，林纾对北大的指责全是造谣污蔑。至于林纾对他所作的人格污蔑，蔡元培表示，自己平生不喜欢讲骂人的话、轻薄的话，对林的“失德”言语置之不理。对传播谣言、败坏学校名誉、与林纾里应外合的坏学生，蔡元培则根据校规，给予开除。这个学生被开除后，无话可说，就去拜见林纾。林纾赠给他文章，给他安慰，希望他回家去读孔孟之书，而自己心里却不免有些悲凉。就这样，林纾被批驳下去，这场被人们称作“蔡林之争”的论战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 七、在五四运动中

一个多月后，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拉开了。这场运动正是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校园开始的。

原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侵略者德国战败投降。消息传来，蔡元培非常兴奋，心想，作为战胜国，中国可以收回被德国人侵占去的主权了。他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了。

第二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战后的有关问题。中国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中国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为配合中国的正当要求，蔡元培等人发起“国际联盟同志会”与“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把中国失去的权利要回来。

但是，蔡元培的希望落空了，全国人民的希望落空了。巴黎和会竟然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并且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不是还给中国，而是让给日本。就是说，中国虽属于战胜国，而待遇却同于战败国。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全国人民无不愤慨。1919年5月2日这天，蔡元培寝食难安。就在刚才，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江大燮来到他家，偷偷告诉他，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已经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答应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准备在条约上签字。经过考虑，他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北大学生代表，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大会，商讨挽救办法。当他把这一消息告知师生后，人群立刻炸开了。大家当即决定，5月3日晚上召开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同时邀请各兄弟大学的代表参加。第二天晚上7时，大会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一名学生当场把手指咬破，用血书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字。还有人拿刀要自杀，想以此唤醒并激励国人。群情激昂，非常感人。会议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

5月4日，恰好是星期天，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几千名师生愤怒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来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高呼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集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急忙给蔡元培打电话，希望帮助制止学生游行。蔡元培当场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结果，杨振声、江绍原、许德珩、潘淑等几十名学生遭到军警逮捕。蔡元培得知消息，立即设法营救。他对学生们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当天晚上，师生们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蔡元培还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共同商讨对付警察厅的法律手续问题。会后，蔡元培前往军阀段祺瑞最敬重的一位孙老前辈家中，请求孙老先生向段祺瑞说明当日学生的举动完全出自爱国，应该无条件释放。孙老先生在蔡元培的请求下，答应去试一试。又过一天，5月5日清晨，教育部命令蔡元培等各学校校长，把“闹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下午2时，蔡元培与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接着，他便率领校长代表团前往警察厅和教育部，又去国务院及总统府，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他愿意以身家性命作担保。6日，蔡元培又为营救学生奔波了一天。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得到释

放，蔡元培亲自率领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前去迎接，并且发表讲话，给学生们安慰和勉励。

北京的行动轰动了全国，也传播到海外。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同学。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的华侨学生也开展了爱国活动。反动派害怕了，他们也更加憎恨蔡元培。

本来，人们对“蔡林之争”还记忆犹新，现在又由他做校长的北京大学引发了五四运动，蔡元培益发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集中攻击。他们质问：北京大学学生“闹事”，你做校长的该负什么责任？他们追根溯源，发现蔡元培就是引发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谣传要暗杀他。警备司令段芝贵说：“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国务总理钱能训则斥责教育总长傅增湘：“你说蔡元培的校长地位不可动摇，那他死掉又当如何？”还有谣言说军阀们要烧校舍，杀学生，在景山架炮准备轰击。为了不给反动势力留下把柄，保护学校和学生，蔡元培决定辞职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剃掉长胡子，悄然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准备第二天乘车去上海。南下途中，他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我深信同学们的举动“纯出于爱国之热诚”。尔后，他曾经多次谈到五四运动，认为“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觉醒国人的工夫”，理应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

师生们听说敬爱的蔡校长要辞职，全都舍不得。为此，他们特意组织了“挽留蔡校长”运动，与政府当局严正交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校。这一行动，很快得到北京各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响应与支持。反动政府的司法总长朱深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不禁感慨地说：“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他们收买了20几个内奸，在北大法科秘密开会，想冒用全体同学的名义，通电欢迎新校长胡仁源，把蔡元培赶走。没想到，他们的阴谋被当场识破，其中5人被学生们抓了起来。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又到法院起诉，状告北大学生滥抓无辜。结果，有11位学生因此被关进监狱，准备判刑。蔡元培急忙给熟人写信，请他们帮忙斡旋，以免学生吃亏。给过反复斗争，最后，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取消新校长的任命，挽留蔡元培。9月，蔡元培又回到北京大学，直到1923年初才离开。

## 八、向各种恶势力开战

同各种恶势力展开顽强斗争，无私无畏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维护人权，是蔡元培生命历程中的闪光一页。他所与之斗争的恶势力，既有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也有国内的军阀反动派，以及蒋介石、国民党等各种反动人物与党派。

### （一）向军阀开战。

蔡元培特别痛恨军阀，认为好端端一个国家，全让军阀们给糟蹋了。所以，只要有办法，他便同反动军阀进行顽强斗争。

1922年1月，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因为领导劳工运动，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他愤然写了《黄庞流血感言》一文，号召国人“完成两先生没有



做成的事业”，“替两先生复仇”，“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他并且说：“我们后死的人，第一责任，是在劳工会里大大的尽力，叫每个劳工都有两先生的精神，使他们杀人的知道拔去一二个眼中钉，反增加了无数。”

192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借口金法郎案，非法要求逮捕无辜的财政总长、北京大学兼职老师罗文干。蔡元培对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非常愤慨，当即发表《不合作宣言》，并提出辞职，表示：不能与干涉司法独立、践踏人权的教育当局再有任何关系。他当天就离开了北京，然后经上海去了欧洲。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

## （二）向帝国主义者开战。

蔡元培在国外多年，对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了解得比较清楚。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可以通过他在五卅运动之后的表现反映出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100多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打死群众10余人，伤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蔡元培在国外听到消息，愤怒的火焰填满胸膛。6月下旬，他致电北京大学及全国各团体，表示对运动“深以不能亲自参加为憾”，指出：应该立即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接着，他在德国汉堡撰写了《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并翻译成英、法、德3国文字，分送欧洲各国报刊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与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真相，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后来，他还撰写了《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高度评价五卅运动这一反帝爱国壮举，指出：运动使“英人在华之商业一蹶不振，中国被压迫群众对帝国主义者之肉搏，亦由此开始。中国民族在国际上之独立运动，五卅烈士，实开其端。”

## （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

国民党本来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党，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过伟大贡献。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党内具有崇高地位。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对这一职务安排，孙中山解释说：“蔡子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尔后，在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上，蔡元培均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当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时候，他正在国外。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责任，依旧积极支持并配合国内反帝反军阀的艰苦斗争。所以，1926年2月，他一回到国内，立即参加了讨伐军阀的北伐战争，在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由于他刚刚回国，时间很短，对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式缺乏深入了解，加之蒋介石的反动本性还没有完全暴露，所以，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也不太了解，曾经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使国家强大起来。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以元老身分授印。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他又是证婚人之一。此外，他还担任了大学学院院长、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内大搞专制独裁，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对外则妥协退让，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其所作所为，很快就使蔡元培觉醒过来，对蒋介石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并开始分道扬镳（bi o）。他不同意国民党当局的对外政策，特别反对其残杀异己的特务政治，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

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和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名铨）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设上海分会与北平分会，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对垒。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成立同盟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反对摧残法制、蹂躏民权的法西斯专制，保障人权，援助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蔡元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遍人权。”他表示，人权保障，第一没有党派的成见，第二没有国家的界限，第三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很快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污蔑、压制、威胁、迫害，接连而至。他们先是对宋庆龄、蔡元培发出警告，污蔑同盟是“非法组织”，又接二连三地向宋、蔡、杨等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蔡元培顶住了这些压力，断然驳斥同盟是“非法组织”的谬论。不久，1933年6月18日，反动派果然下了毒手，在上海将杨杏佛乱枪打死。

杨杏佛被害后，蔡元培痛哭失声，悲愤交加。1小时后，他即来到出事现场视察，随即趋车转往广慈医院看望遗体。2小时后，他召开会议，商讨善后事宜，直到傍晚才散。第二天，不顾劳累，为杨杏佛主办了一切丧葬事宜，并亲自撰写祭文。杨杏佛入殓的当天，大雨滂沱，乌云滚滚，国民党法西斯放出继续杀人的风声，企图阻止蔡元培参加葬礼。但蔡元培没有害怕，没有屈服。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毫不犹豫地毅然来到万国殡仪馆，亲自主持吊唁与祭奠仪式，表现出正气凛然的大无畏气概。致悼词时，他老泪纵横，咽不成声。事后，蔡元培竭力妥筹对杨杏佛遗孤的抚恤工作，并推动中央研究院成立“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作为对战友的纪念。但是，杨杏佛之死却使得民权保障同盟不得不停止活动。

血的教训使蔡元培由一位国民党元老，转变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者与批判者。他曾经对人发誓说：“从此不再进南京城了。”

## 九、革命者的朋友

蔡元培是各种恶势力的敌人，同时又是革命者的朋友。他对恶势力充满无限的恨，对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革命者与爱国者又充满无限的爱。被他拯救、保护过的革命者与进步人士同样是很多很多。

1930年10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共产党员杨开慧，因叛徒告密，被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她60岁的老母亲以及哥哥、嫂嫂在上海找到蔡元培，希望他帮忙营救。蔡元培立即联合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湖南军阀何键，希望能保释杨开慧。但是，反动透顶的何键收到电报后，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段，决定立即枪杀杨开慧，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了。同年11月，著名学者罗隆基因为批评国民党，在上海被逮捕，蔡元培想法设法将他救了出来。第二年初，胡也频又

在上海被捕，文学家沈从文赶到南京，找到正在出席会议的蔡元培，请他设法营救。不久，胡适从北京来信，告诉蔡元培：“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朋友都很感谢，但他已被枪毙了。”8月，邓演达遭被捕，蔡元培同样进行了营救工作。像这样的营救工作，蔡元培真不知做了多少，虽然有些没有成功，但蔡元培是尽了力的。在这样的工作中，蔡元培深深感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黑暗面太多，应该团结、组织起来，同各种黑暗势力做斗争。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同他的同志们一起，开展了营救左派政治犯以及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进步分子的活动，并派代表视察各地监狱的情形。他们先后营救过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廖承志、陈赓、罗登贤、许德珩、侯外庐、丁玲、范文澜、潘梓年、马哲民、陈藻英、余文化等著名人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黄炎培、章乃器、叶恭绰等100多人在上海发起纪念会。由他领衔发表的纪念会缘起说：“50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50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同一天，上海青年会举办科学社会主义讲座，蔡元培带头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1934年12月，他为《社会主义新史》一书作序，指出：该书“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在当时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桎梏思想，禁止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形势下，蔡元培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蔡元培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鲁迅结下了亲密友谊。“四·一二”政变后，鲁迅由广州流亡到上海租界，蔡元培聘请他做大学院特约著作人，使鲁迅有固定的生活收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时候，蔡元培邀请鲁迅参加，并推举鲁迅做上海分会委员。1936年10月19日，比蔡元培小13岁的鲁迅不幸病逝。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执紼（fú）送殡。在墓地举行葬礼，蔡元培致悼词，他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他撰写《挽鲁迅联》，写道：“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随后，他还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积极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并为《鲁迅全集》作序言，称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曾经评价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歿（mò），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这是对两位伟人亲密友谊的恰当评价。

## 十、在抗击日寇的洪流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了沈阳等地。蔡元培看到，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抵抗就撤至山海关内，而且其特务、警察机构还加紧镇压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因而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斗争的决心，更加明确地站到爱国、民主、进步的立场上来。他采取与蒋介石截然相反的态度，千方百计保护抗日爱国力量，坚决主张抗战到底。

蔡元培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声讨侵略者，揭露其侵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革命老人何香凝在上海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蔡元培将自己书写的五副对联赠给展览会展出，为抗日筹集钱财。1933年5月，上海青年会举办“国耻演讲”，他主讲第一讲，题目是《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地揭露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和侵略政策。

第二年，蔡元培从上海到南京，汪精卫请他吃饭。在饭桌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着，两行热泪便流到了盘子里，和着汤水一起咽下，举座无不感动，汪精卫则感到很不自在。

蔡元培抵抗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得到中国共产党人赞扬。1936年9月20日，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称赞蔡元培的爱国抗日主张，说：“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人！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问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进攻中国。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11月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不得不随同迁往内地。蔡元培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又不愿意跟着国民政府后退，就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蔡元培的身体因患伤寒病尚未复元，所以非常虚弱。但是，他仍以古稀之年、病老之身，不知辛苦地尽瘁于国事，一刻也没有忘记国难家仇。1938年2月，他在一首诗中抒发抗战必胜的信念：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表明他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心。4月，他的老朋友、共产党人吴玉章由欧洲回国，路经香港与蔡元培晤谈时，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5月20日，他在香港公开演讲，希望发挥美术与美育的作用，为抗战作出贡献。第二年，他被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又填一首《满江红》词，作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会歌：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不必问领土大小，军容羸拙。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将野心军阀尽扫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摧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年，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激昂慷慨，表现出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

## 十一、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主持中央教育院，是蔡元培继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中国现代教育与科学事业史上的又一盛举。

设立中央研究院的倡议，是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它是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是国家科学文化水平高低的象征。1929年，蔡元培辞去国民政府一切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使该院成为他推行科学救国理想的基地和晚年事业的中心。他像一位勇敢坚毅的拓荒者，将汗水和心血抛洒在中国现代科学的荒原上，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为什么要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呢？原来，蔡元培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倡教育和科学。他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科学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近代西方国家所以繁荣强盛，就是由于学术人才辈出，科学昌明发达。德国有克虏伯，使本国的军械甲于天下；法国有巴斯德，能使本国酿酒、造丝、畜牧等事业特别稳固发达；美国有爱迪生，能为美国开辟无数利源。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发明家。他希望通过中央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为祖国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从蔡元培自己的志趣来说，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读书、研究学问。他曾经说：“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作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所以，尽管他从事的依然是行政工作，但是能在中央研究院这样一个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任职，他觉得符合自己的脾气禀性。

基于上述认识，蔡元培在经费非常不足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于使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尔后，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研究院的发展上面，直到逝世为止，共担任13年院长。

研究院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总办事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由于蔡元培与蒋介石政权有矛盾，住在南京感觉别扭，所以常年在上海办公。到1930年初，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心理、动植物、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网罗到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翁文灏(hào)、竺可桢、丁西林，著名学者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陈垣、刘半农、徐中舒、罗常培、杨端六、蒋廷黻(fú)、王云五、陈翰笙、陶孟和、何廉等等，还有些外国专家，真是人才济济，荟萃一堂。有了这些人，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便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丰硕成果。

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发现大量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和甲骨卜辞，取得了震惊世界考古学界的重大成果。这是中国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地下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发表了《冰期的庐山》这一科学名著，获得国内外很高评价。此外，天文研究所建造了著名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了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农村经济调查，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单纯跟着西方科学成就后面跑的可悲局面，使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第一次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这在旧中国的恶劣环境下，实在了不起。

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具有良好的学术空气。这与蔡元

培知人善任、选贤择能、宽容大度的作风是分不开的。院里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陈翰笙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还十分注意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本来就是设立中央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杜外人之覬（jī）觎（yù）”。中央研究院设立前，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借“考察”的名义随意出没，得到的标本统统运到外国。有了中央研究院，就逐步对外国人这种无理行径加以限制和监督。一次，有5个日本人准备在长江一带调查水产动物，不同任何中国部门打招呼，就出发前往四川探查。蔡元培得知此事后，就与外交部联系，请他们与日本人交涉，让日本人讲清楚调查目的和区域，研究院派人参加；调查得来的标本，要先送研究院，由专家审查，认为确实在允许范围内的，才能带走，并要将标本留存中国一份。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日本人不能在中国搞什么调查。以后，蔡元培还给交通部写信，让他们取缔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无线电台。类似这种维护国家主权、不向外国人低头的爱国举动，从蔡元培那里可以找到许多。

中央研究院短时间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令蔡元培对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我们民族并不是没有创造力的，如指南针，如印刷术，如火药，我们先人曾有过伟大的贡献。我们只要肯勉力，决不是束手无策，只吃现成的。”他经常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句话来勉励研究院的同事们抓紧时间，增强忧患意识。他虽然没有看到祖国科学繁荣的春天，但他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开创之功，却越来越显示出不朽的、历久弥新的价值。

## 十二、勤俭正直的一生

蔡元培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教育，为人类进步，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却没有为自己索取任何东西。他没有积蓄，没有资财，出国留学靠的是朋友资助和稿酬。回国后，身为社会名流，但连个藏书的房间都没有。最后，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捐助，才使他的书有一个存放的地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每月工资600元，非常高，但因为经常捐献，所以仍不宽裕，常年节衣缩食。有一次，某学生从校长室门前经过，见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说是送饭给校长吃，就好奇地打开盖子看一看，见只有一碟木须炒肉、一碟醋溜白菜、几个馒头。这个学生原以为校长每顿饭虽不是山珍海味，也会三盘四碗，没想到竟是这么简单，不禁大为感动。实际上，蔡元培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他一生为人谦让和蔼，从不对人疾言厉色，从不损害他人人格，从不与人争风吃醋。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是对达官贵人，还是对平民百姓，全都一样。别人着急，他就说“慢慢来”。每天从校门经过，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还礼，令这些觉得自己没有身分的人直吐舌头。他还特别富有同情心，不坐由人肩抬的轿子，也不忍心坐人力车。但是，遇到原则性的问题，即使面对的是学生，他也绝不退让，敢于坚持到底。一次，有些学生不肯按规定交讲义费，聚在一起，要求免费，秩序大乱。蔡元培认为学校的规矩不能破坏，来到红楼门口，挥动着拳头，大声对学生们说：“谁破坏校规我就跟谁决斗！”学生们见校长真的生气了，便纷纷散去。又一次，他得知

学生傅斯年等人写匿名小字报骂另一位学生，就公开给予批评。指出，同学有缺点可以帮助改正，但不应采取写小字报的方式。这件事使傅斯年深受教育。

做监察院长的时候，他家客堂里只沿墙放着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方桌，四个方凳，就没有其他陈设了。任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每月的工资不够用，经营人员给他增加了200元，他发现后，当场把钱退回。一次，他到南京办公，与人同住一个套间。蔡元培起床较早，而外间的同事还在睡觉。他怕吵醒同事，就宁愿不洗脸、不刷牙，一声不响地在里间看书。到香港后，房租贵，物价高，子女要教育，他本人要看病，常常没有钱用。甚至当地的下层劳动者都比他生活得好。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名誉地位，去向有钱人请求帮助。1940年过新年时，他实在没有钱过年，也只是向最要好的老朋友举借，不麻烦他人。由于生活困难，使他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生病也不能从根本上医治，只能敷衍了事。国家被侵略，人民遭蹂躏，他生气，伤心，更影响到身体日坏一日。蔡元培死后，依然是无一间房，无一寸土，生前所欠医药费1000余元，家人竟无力给付，甚至连衣食棺木的费用也是别人代筹的。他有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

对蔡元培的逝世，全国人民不分政治派别，不论天南地北，全都同声表示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唁电说：“先生为革命奋斗40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革命圣地延安的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大会，并发表唁电说：“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1917年）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沮。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戒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对蔡元培一生的评价，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革命历程和人格风貌，确切地表达出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